



**【ESG观察】**

**通过政府、企业、个人三方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消除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现象,激发社会所有人才资源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 推动职场性别平等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匡继雄

三八节过后,职场性别平等、“她经济”等女性议题持续活跃,其中性别平等是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中社会和企业治理的重要议题,受到境内外ESG相关组织或机构的重视。

联合国设立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第5个目标是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赋能,要求企业采取行动,消除性别不平等现象,并确保女性在就业、领导地位等方面享有平等机会。

纳斯达克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香港交易所等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已相继颁布了与ESG信息披露相关的政策文件,推动企业董事会多元化,为女性提供更多参与董事会层面的机会。如港交所已于2021年修订《企业管治守则》,不再接受董事会只有单一性别成员的上市申请人,现有上市公司也须于2024年底前遵守相关规定,届时所有在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最少有一位女性。

此外,“性别平等”作为重要评估指标被纳入各大机构的ESG评级体系。如国际ESG评级机构汤森路透在社会维度雇佣员工方面下设保持员工多样性与机会平等指标;国内ESG评级机构商道融绿在社会维度员工方面下设女性员工比例、员工政策等指标,在公司

治理维度下设董事会多元性等指标。

## 三大作用

恒生聚源数据显示,从董事会女性董事占比来看,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占比在20%以下的上市公司数量占A股公司总数的比例(简称上市公司比例,下同)较2018年下降7.31个百分点;而女性董事占比在20%—30%、30%—40%、40%—50%、50%以上四个特定区间的上市公司比例分别较2018年提升3.05、1.108和2.18个百分点。

从女性高管占比来看,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占比在20%以下的上市公司比例较2018年下降8.3个百分点;而女性高管占比在20%—30%、30%—40%、40%—50%、50%以上四个特定区间的上市公司比例分别较2018年提升2.03、0.76、1.02和4.49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反映出近年我国职场高层中的性别平等状况有所改善。这一趋势的形成主要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法规、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升了社会对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知、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等因素有关。微观层面来看,推进性别平等对上市公司主要起到以下作用:

一是提升财务表现。性别平等意味着不同性别、不同经验和观点的人员共同参与决策过程,能够减少群体

思维,避免盲点,带来更广泛的视角和更全面的决策,提高团队的创造力和决策质量,进而帮助组织提升竞争力,取得更好的财务业绩。女性高管还能够更好地反映客户需求,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据中国年度消费数据报告,中国75%的家庭总消费由女性来做决策。因此,随着社会和消费趋势的不断变化,企业将女性纳入市场开发等决策过程有助于有效扩大市场,提高公司业绩。

二是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女性更倾向于规避风险,有女性董事的董事会更可能关注潜在的风险问题,平衡男性董事过度自信导致的决策风险,不采取激进的高风险策略,促使企业加强风险管理。

三是树立品牌形象。关注性别平等可以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向外界传递积极的价值观,提升企业的声誉和品牌形象,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和客户。

## 三重原因

根据MSCI(明晟)对全球中大型企业高管层的性别多样性情况统计,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董事席位的女性占比保持稳定提升,从2018年的11.1%增长至2022年的14.8%。然而这一比例仍低于MSCI世界指数成份

股31.3%的平均水平,显示出我国在性别平等方面与国际水平存在一定差距。这一差距主要受以下原因影响:

一是受制于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和社会文化往往将女性视为家庭的主要照顾者,这给女性职业发展带来了更多挑战和限制。

二是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缺乏完善的生育、教育等支撑体系,导致女性更多地投入家庭,使企业在招聘女性员工时产生顾虑。

三是政策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关于鼓励雇佣女性的激励政策和相反的惩罚性政策缺乏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更多是停留在表明倡导层面。

## 四项建议

对于上市公司如何提高性别平等状况,笔者有以下建议:

一是将性别平等纳入企业ESG战略乃至公司战略。树立战略意识,制定和实施涵盖招聘、晋升、薪酬、培训等方面性别平等政策。设置明确的监督考核指标,如女性高管比例、女性董事比例等,并公开性别平等政策执行情况,接受内外部的监督和评估,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以确保性别平等的原则在公司的各个环节中得到落实和执行。

二是建立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和福利政策,如远程办公、弹性工作时间等,帮助员工在职业发展和家庭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鼓励开放的沟通和多元意见的交流,提供公平的晋升机会和发展资源,打造包容性、多元化的企业文化。

三是利用新技术降低性别工作差异。鉴于男女在体力上的差异,通过利用新技术降低传统工作对体力的依赖,使原本只适合男性的工作也适合女性。

四是加大宣传,打破传统观念。很多国内传统意义上只适合某一性别从事的工种在国外早已实现了性别多元化,这需要企业加大宣传,打破传统观念,增加男性在传统女性主导行业的比例,如医疗医护领域;同时增加女性在传统男性主导行业的比例,如工程领域,以实现性别平衡。

当然,推进性别平等不仅需要上市公司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政府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同时也需要个人积极争取发展机会。通过政府、企业、个人三方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消除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现象,激发社会所有人才资源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者系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研究员)



**【玲言献策】**

**建议出台产业并购相关政策,支持大型公司并购处于同行业或上下游、与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的优质标的,进一步拓宽股权投资退出渠道。**

# 借鉴美以经验 完善中国股权投资机制赋能科技创新

黄亚玲

美国和以色列的发展实践证明,在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中占据领先地位,离不开股权投资市场的支持。尤其是在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首要决定性因素的形势下,通过股权投资培育创新生态系统和国家创新体系刻不容缓。

## 美以股权投资实践

美国和以色列股权投资市场在促进科技创新的成功经验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两国“法无禁止即许可”的立法理念,以及在此理念下建立的强有力的制度体系,即正式规则(比如与行业中介、产权交易、公司治理等相关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范准则及价值观(比如创新文化、冒险精神等)。这一制度体系的最大意义在于规范和理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尽可能地营造流动性最大化和信息不对称最小化的市场。

一是为股权投资市场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银行、保险、社保、养老金、捐赠基金、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是美国和以色列股权投资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以美国为例,1978年政府允许养老金以有限合伙人(LP)的身份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一项改革大大地促进了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从个人投资者为主向机构投资者为主的转型,极大程度拓展了基金募集规模,此

后,大学捐赠基金、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等机构也成为基金的主要投资人。

二是本土大型公司和股权投资基金成为科技创新的主要投资主体。在“法无禁止即许可”的立法理念下,美以两国允许本土各类不同规模和类型的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投资科技创新,形成以大型企业风险投资(CVC)和股权投资基金互为补充互为加强的股权投资格局。其中,股权投资中的风险资本更侧重于科技创新的早期阶段,并购侧重于科技创新的中后期阶段,而CVC侧重于母公司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领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美以两国对外资机构在本地投资给予了一定的开放度,但是在关系到产业控制和国家战略领域的科技创新领域,两国仍然限制外资机构进入。

三是及时调整市场规则为股权投资市场营造高度自由包容的环境。两国公共政策在股权投资不同的发展阶段侧重功能也有所不同。在股权投资市场早期发展阶段,公共政策偏重于资金引导功能。比如,以色列1993年组建首只政府引导基金Yoza,用于创新企业股权投资和风险基金投资,该基金初始规模1亿美元,引入外部社会资本1.5亿美元。随着股权投资市场的成熟,公共政策偏重于改善和维护市场投资环境,包括提供IPO和并购等多种退出渠道,保护投资人利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比如,美国2023年颁布《投资顾问法新规》,加强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和监测,对杠杆较小的创业投资基金

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策略侧重于合规,鼓励该类私募基金进一步提升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对杠杆较高的对冲基金,监管策略侧重于强化风险控制,强化杠杆水平监测和系统性风险评估。

## 中国股权投资的不足

当前支持科技创新的股权投资主体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大型公司所属的股权投资机构、股权投资基金(包括创业投资基金)。受内外经济形势、政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中国股权投资在支持科技创新上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长期资金供给不足、投资退出渠道有限、资本融合深度不够等方面。

一是长期资金供给不足。科技创新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等特点,需要大规模的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从当前市场情况来看,一方面,现有股权投资基金存续期普遍为5—8年,难以满足颠覆性突破性的科技创新尤其是早期阶段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国资央企和政府引导基金出资规模占总投资比例高达70%,银行、信托、券商、保险、养老金等合计出资占比不足30%,尚未成为股权投资基金的长期资金来源。

二是投资退出渠道有限。投资退出是股权投资机构出资人实现投资价值变现的必要路径,决定了科技创新获得再次投资的资金规模。数据显示IPO和并购作为股权投资主要的退出通道近年

来呈收紧态势,2023年我国股权市场共发生3946笔退出案例,同比下降9.6%。其中IPO作为主要方式占比54%,退出数量同比下降38.3%,并购方式退出仅占总案例的6%,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股权投资的退出难度和退出周期。

三是资本融合深度不够。这已经成为困扰股权投资绩效和科技创新效果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运营和投资目标不一致两方面。在投资运营方面,混合所有制的股权投资机构面临着企业文化、激励约束、收益分配、控制权安排等方面的冲突;在投资目标方面,财务投资人更偏重于短期实现财务收益最大化,战略投资人则更偏重于长期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链战略,而周期长风险高的科技创新项目通常在短期内很难盈利,这就导致财务目标与国家战略目标在短期内不一致,从而降低了科技创新投资绩效。

## 相关建议

美国和以色列的经验说明,存在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和稳定性的资本池是决定股权投资能否持久有效支持科技创新的首要因素。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以两国虽然被誉为富有创新力的国家,但是在科技创新领域实行的是保护主义策略,遏制国际竞争对手在本地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基于此,我们建议,发展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要对现有的资金来源和投资退出政策有所突破。

一是拓展长期资金来源。建议鼓励养老金、企业年金等配置一定比例的科技股权投资基金,筛选优质的管理机构试点管理,放宽社保基金投资产业基金和股权基金的比例限制;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用于创业投资,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创业投资企业发行用于科技创新领域的债券提供增信支持;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股权投资机构深化合作,探索“贷款+外部直投”等业务模式。

二是适度扩大股权投资退出渠道。建议出台产业并购相关支持政策,支持大型公司并购处于同行业或上下游、与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的优质标的,进一步拓宽股权投资退出渠道。建议设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支持股权投资活跃的区域股权市场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份额转让试点。

三是进一步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引领作用。建议支持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推进“自有资金+母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CVC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主导功能,在对二三级基金业务管理平台保持控股的基础上,支持三级基金管理公司引入战略投资人实现股权投资结构多元化,进一步提升投资决策、业绩考核、市场化选人用人、员工激励等市场化程度,促进资本融合。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供职于国家电网集团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燕语西东】**

**坊间认为,这次削减学签,主要是整治野鸡大学,受冲击最严重的是印度学生。**

# 加拿大留学账本

筱燕

1月下旬,加拿大移民部长Marc Miller公开表示将削减留学生签证,预计2024年比2023年减少35%!降幅之大,引起了坊间的热议,新政对华裔留学生的影响也成为本地华人社区的聚焦话题。

作为美国和欧洲教育的“平替”,加拿大教育受到大多数华裔家长的认可,不仅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华裔面孔,高中和小学也出现了不少华裔小留学生,多伦多的华裔陪读妈妈已是一个不小的群体。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帮陪读家庭在多伦多租房,对她们初到异国他乡的酸甜苦辣,我感同身受。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留学需要先算账,谋定而动。

疫情后留学生来加求学,发现“平替”一点不平,加拿大在疫情期间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流动性泛滥,房价和物

价高得让人咂舌。留学生因房租太贵无力承担,几乎要流落街头,这样的故事在本地英文媒体中屡有报道。Miller直言不讳称,新政出台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减轻住房需求的压力。

多伦多作为留学生和移民的首选之地,人口不断涌入,一方面住房缺口长年存在,盖房速度和效率难以满足原有需求,新增需求又源源不断,导致房价贵得本地人也吃不起,房租涨幅惊人。据多伦多地产局官方数据,以多伦多市一个卧室的公寓月租为例,2023年三季度全市均价2674加元,市中心均价则高达2799加元——这意味着在多伦多大学本部求学的国际学生,开学前在学校附近租住一室公寓,每月房租近15000元人民币!这超出了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

除了房租的负担,学费是更大一笔开销。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称,2022到2023学年的国际学生,本科教育一年平均要支付学费35836加元,是本地学生的5.2倍。这个均值,远低于多伦多大学等华裔认可的名校;普通大学、社区大学、大专,其学费相对便宜,但历来不是华裔留学生的主流选择。

我大学闺蜜的儿子,去年来多伦多大学留学,一年学费本地学生8000加元,他要付60000多;一年新生可以申请宿舍,他住的是四卧两卫套房中的一个房间,月租近2000加元;吃饭是强制购买的膳食计划,一天三餐勉强吃饱大约要60加元。粗略算算,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一年要花50万元人民币,还不包括往返机票等费用。

上面算的是读大学的账,读高中要花多少钱呢?多伦多地区一些公立高中接收国际学生,学费一年约18000加元。如果考虑私校,学费则高低不齐,口碑稍好大多在30000加元以上。住宿方面,以

华人喜欢的万锦和列治文山为例,要么找本地寄宿家庭,一间带独立洗手间的卧室,包一日三餐,大约每月2000加元;要么有家人陪读,在学校附近租房,地下室月租金也要2000加元以上了。

多伦多大学本部留学一年,父母要掏50万元人民币;高中留学一年,最少要掏30万元。无庸讳言,留学是一个千亿级市场,国际学生是校方重要的收入来源,以安大略省为例,近三分之一大学生是国际生。难怪这次新政一出,不少高校都炸了锅。

业内人士的看法是,新政势在必行,过多招收留学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4000万人口的加拿大,2023年史无前例接收了80.7万名国际学生,要知道,人口是加拿大8倍的中国,2023年接收的留学生也不过是105.7万名!

全球通胀之下,加拿大教育相比而言,仍可算优质平价,其开放的移民政策、友好的多元“马赛克”文化,都构成了对亚裔的吸引力。按2023年数字,印度留学生以32万名高居榜首,且从2019年到2022年每年递增47.39%;中国第二,约10万名,从2019年的14万逐年递减;菲律宾第三;伊朗第六;韩国第七;越南第八。前三名都是亚裔,前十名有六个是亚裔。

坊间认为,这次削减学签,主要是整治野鸡大学,受冲击最严重的是印度学生。据称,印度留学生中甚至有这样的组合:一方靠野鸡大学获得学签,另一方和前者假结婚,拿配偶工签来加打工,新政有的放矢,动的就是野鸡大学和配偶工签这两块奶酪。好学校所受影响不大,华裔学生所受影响更是有限——如果来加寻找诗和远方,请充分预知远方的苟且,现实中难啃的面包,建好留学账本,珍重前行。

(作者系旅居加拿大华裔作家)